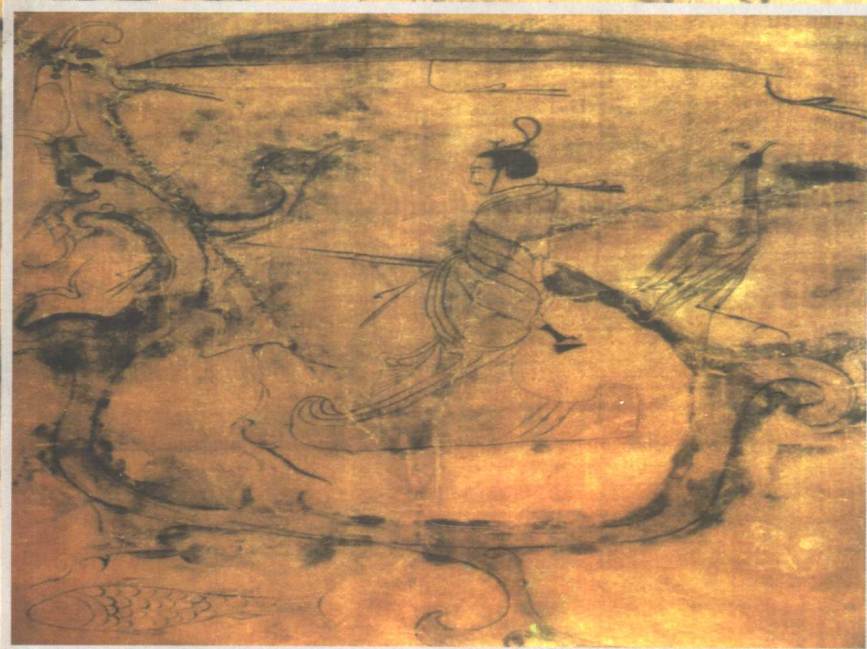




世纪 艺术文库·史述编

尚永亮 著

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世纪 艺术文库·史述编

尚永亮 著

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尚永亮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10

(20世纪艺术文库)

ISBN 7-5039-1949-3

I. 庄… II. 尚… III. ①庄周(前 369~前 286) - 文学研究
②屈原(约前 340~约前 286) - 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124 号

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

尚永亮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00,000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949-3/J·582

定 价:19.20 元

目 录

上 篇 庄子论

第一章 看透人生的智者——庄子	(1)
一、处穷守拙的狷介个性	(2)
二、对混浊时事的激愤情怀和强烈批判	(5)
三、源于生命忧恐的人生思考	(11)
四、遁世情怀与智者风神	(18)
第二章 矛盾的庄子和庄子的悖论	(29)
一、《逍遥游》与《齐物论》的矛盾	(31)
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小大之辩”	(36)
三、《逍遥游》的三个层面和逻辑顺序	(42)
第三章 《庄子》浪漫文学探微	(48)
一、浪漫精神与道境	(48)
二、《庄子》中的形象与三“言”	(50)
三、想象、虚构、夸张和抒情性描写	(54)

四、奇文、妙境、哲思·····	(62)
五、缘起与归宿·····	(65)
 第四章 《庄子》与后世浪漫文学之发展·····	(72)
一、反叛世俗的精神·····	(73)
二、愤而为文的豪气和情辞·····	(78)
三、浪漫文学的末路·····	(83)
 中 篇 屈原论	
 第五章 屈原生年榷论·····	(91)
一、从朱王之争看摄提的本义·····	(91)
二、岁星纪年与摄提格的由来·····	(93)
三、“摄提贞于孟陬”与屈赋历法·····	(98)
四、岁星与摄提的关系及屈原生年之谜·····	(103)
 第六章 《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	(108)
一、《哀郢》创作之缘起·····	(108)
二、《哀郢》创作之时间·····	(115)
三、从《抽思》看《哀郢》·····	(118)
四、屈原放流的年代和地点·····	(121)
五、“陵阳”说和屈原的归宿·····	(130)
 第七章 屈赋风格与屈原人格·····	(135)
一、沉郁哀怨的情感抒发与悲婉格调·····	(137)
二、劲直峻伟的志节和风骨·····	(142)

三、审美意向和艺术造境的清奇高远	(146)
 第八章 屈原贾谊的意识倾向和模式意义	(154)
一、屈原的意识倾向和模式构成	(154)
二、贾谊与感士不遇主题	(162)
三、执著与超越之间	(167)
 下 篇 庄骚传播接受论	
 第九章 《庄子》在秦汉之世的传播和接受	(171)
一、《庄子》之成书及其在先秦的传播	(172)
二、西汉前期《庄子》接受者	(174)
三、《庄子》传播和接受的低潮期	(184)
四、东汉后期的任性贵生与《庄子》传播	(190)
 第十章 魏晋名士与《庄子》解读	(198)
一、庄子与名士风流	(198)
二、玄学演进与庄学地位之提升	(211)
三、注《庄》解《庄》之风的盛行	(221)
四、魏晋名士的绍庄之作	(232)
 第十一章 《楚辞》在西汉的传播地域和 接受群体	(257)
一、京都长安及其周边地区	(257)
二、以寿春为中心的九江郡及其周边地区	(263)
三、中心传播地域的确立与武帝	

时代的接受群体	(270)
四、西汉中后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者	(276)
 第十二章 东汉之世对《楚辞》的解读和	
关于屈原的论争	(282)
一、东汉之世对《楚辞》的接受和解读	(282)
二、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及其原因	(285)
三、王逸之作《楚辞章句》及其对 班固的反驳	(292)
四、王、班论争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296)
 第十三章 刘勰对屈原的态度及	
今人对《辨骚》篇的误读	(302)
一、刘勰对屈原是褒还是贬?	(303)
二、刘勰对屈原作品采取什么态度?	(306)
三、刘勰怎样看待屈赋中的浪漫特色?	(314)
四、刘勰对屈原及其辞赋之态度的 现实原因	(317)
五、刘勰在评价屈原及其辞赋上的局限	(319)
 第十四章 中唐诗人对屈原的	
接受和超越	(322)
一、接受态度的群体转移	(323)
二、困境中的执著	(325)
三、超越屈原模式	(330)

四、走向陶渊明	(333)
附 录	(339)
闻一多对庄子的礼赞、解剖和扬弃	(339)
《九歌》研究之误区	(353)
庄子哲学思想研究之四阶段及其得失	(358)
庄子研究三十年	(373)
文学《庄子》二十年	(389)
后 记	(405)

上 篇 庄子论

第一章 看透人生的智者——庄子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惘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庄子·齐物论》

人生，一个巨大而难解的永恒之谜。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的价值何在？在污浊的现实中，人应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如何获取精神的自由？……这样一些曾使无数人困惑并引起他们深深思考的问题，首先是由庄子交出了一份系统而独特的答卷。

固然，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一位充满思辩色彩的哲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位退避社会的隐士，可以说他愤世嫉俗，也可以说他消极颓废，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须承认，他在本质上乃是一位看透人生的智者。他的激愤，他的逍遥，他的圆融，他的怪异，都与他对人生的深明洞达紧相关联。如果说，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多于治国安邦的外在目的上用力，因而更注重一种浩然之气的发越和仁人之心的推广，那么，庄子这位道家先驱便致力于对自我人生和个体生命的把握，从而也就更注重对整个人类命运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如果说，前者在给予后世以强大的伦理道德影响的同时，也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封闭了他们敢怒敢骂、追求个体自由的路途，那么，后者便以其对社会政治的自觉疏离和通体散发的处世智慧，昭示着后人从社会返回自我，从人世退归自然，从狭隘的思维定势走向精神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后人读庄有言：“此老胸中了然，笔下了然，战国诸儒，洵未有能及之者。”^①又谓：《庄子》一书乃“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②。由此联及庄子的为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位逍遥旷放而又不无神秘色彩的智者，着实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奇人。

一、处穷守拙的狷介个性

庄子之奇，首先表现在他身处贫困而鄙弃富贵，坚持自我的狷介个性上。

庄子名周，战国前期宋之蒙人^③。据史书极为简略的记载和《庄子》一书的有关片断，我们知道，庄子大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与楚威王、赵文王等有过接触，与当时学界名人惠施交往较多，而与同时的孟子则未曾谋面。据《朱子语类》：“李梦先

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曰：‘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是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否？’曰：‘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或云：‘庄子却不说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熹的说法，大体可信。庄子曾一度做过蒙地掌管漆园的小吏，而大部分时间则是用来著述和讲学的。其学说不为世重，故名气不大，弟子也不会很多。

由于绝意于仕途，庄子的生活自然相当贫困。《列御寇》篇说他“处穷间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外物》篇更详细地记载了他向人借贷的故事：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处所。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对于涸辙之鱼来说，斗升之水即可活命，但关键是要及时，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庄子来说，重要的是要解救无粟度日的燃眉之急，而不是去等待那遥遥无期的“三百金”。在这则寓言里，监河侯的回答、庄子的比喻和两个“忿然作色”，深刻地揭示了富

人的狡诈和庄子生活的困顿贫寒。如果将上述几处文字连贯起来，我们眼前便呈现出一形象的画面：一位身穿粗布衣服、打着补丁、面黄肌瘦的学者，身处陋巷，饱经风寒，在编织草鞋、向人借贷的生活中，迈动着艰难而沉重的步履！

庄子的生活之所以如此困顿，并非他没有谋取富贵的本领和机遇，而在于他从根本上即打消了谋取富贵的念头，他以深刻的人生经验及其对社会政治的全部体察，自觉地保持着与权贵们的距离，从而展现出一种迥异流俗的狷介特立的个性。《秋水》篇载：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列御寇》篇载：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这两则故事很可以见出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态度。在他看来，官场好比一个残酷的争斗场，一旦涉足其中，等待着自己的必然是有如神龟、牺牛那样的命运，所以，他宁可“曳尾于涂中”，也绝不去做统治者的帮凶和牺牲品；宁可在“困穷织屨”的生活中艰

难度日，也要维护自己的品格和操守！用他的话说，就是“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否则，“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便会成为“倒置之民”（《缮性》）。

庄子的个性是狷介的，狷介之中又含有他藐视流俗特立独行的孤傲。这种孤傲，既是他与社会政治格格不入的起因，又是对社会政治深刻体察从而自觉疏离的结果。于是，孤傲与狷介凝聚在一起，遂成就了庄子高蹈不羁的奇人品格。请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秋水》

显而易见，庄子对惠施的相位是极度藐视的，竟至于将其比作专吃腐鼠的鸱鸟；而他对自己的期许又是极高的：“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是的，以庄子的才华论，若欲跻身官场捞取高官实乃轻而易举之事，但这样一来，势必会“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泯灭自我的真性情，而这又是庄子所深恶痛绝的。所以，在社会政治与个体生命、利欲权势与自我品格的矛盾中，庄子毅然选择了后者。《天下》篇说“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让王》篇更明确宣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这种不屈己，不干人，摆脱一切利害计较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人生态度，不正鲜明地展现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狷

介孤傲的个性和清白磊落的品格么？

二、对混浊时世的激愤情怀和强烈批判

庄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风云动荡的时代。秦、齐、楚、韩、赵、魏、燕等战国七雄或连横，或合纵，干戈扰攘，争霸天下，使得哀鸿遍野，烽火连年，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与此局势相应，各诸侯国君则为一己私利而争相聘士，唯谋是用，尔虞我诈，极尽勾心斗角之能事。在此一过程中，统治者专制、残暴的面孔也显露无遗：或标榜仁义，而残民以逞；或动辄杀戮，大施淫威；或醉生梦死，尽情享受。面对这样一个混浊时世，庄子感到了极大的愤怒，他以空前绝后的胆量，挥动如椽之笔，对这一切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揭露和抨击，从而展现出其为奇人的又一重要特征。

打开《庄子》，我们随处都可看到作者揭露黑暗、针砭时弊的激烈言辞：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在宥》

方今之世，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

——《人间世》

被砍下头颅的死尸相互枕压着，带着枷锁的犯人相互推拥着，因酷刑致残的刑徒在街头蹒跚着，这就是当时社会一幅带血的图景！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敢求福，只愿避祸，能免去刑戮，

便是最大的满足了。在庄子看来，这实在是地地道道的“昏上乱相”（《山木》）之世。

因而，庄子的批判锋芒不能不首先直指那些“昏上乱相”。在《人间世》中，他揭露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以致“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在《徐无鬼》中，他痛斥魏武侯“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的奸诈行径，尖锐地指出：“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在《则阳》中，他明言楚王之为人，“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在《列御寇》中，他更对自己故乡所在地宋国的黑暗现实以及被史书称为“桀宋”的宋王偃予以大胆批判：“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在庄子这些充满愤激之情的言辞中，我们发现有两个重要的支撑点，其一是敏锐的眼光，其二是过人的胆量。没有敏锐的眼光，就不可能对纷纭繁杂的历史现象作深层透视，不可能将诸侯国君那专制害民的恶劣本性昭然揭示出来；而没有过人的胆量，就更不可能冒着极大的风险对意识到的丑恶进行无畏的批判。由于庄子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他不仅善于发现，而且敢于怒斥，形诸文字，一针见血，令人读来，石破天惊。事实上，庄子的眼光和胆量是以其对有史以来残酷政治的深刻体悟和全部郁愤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一方面清醒而沉痛地总结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人间世》

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满腔的郁愤，将历史上所谓的贤君明主一网打尽：

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

——《盗跖》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自以为圣人，不亦可耻乎？其无耻也！

——《天运》

这是何等的淋漓尽致，振聋发聩！它不仅令人看到了数千年文明史的真相，而且使人从中获得心灵的猛醒。清人林云铭有言：“庄子似个绝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矢口便骂。”^④所谓“不近情”，正是衷于情而后绝于情的必然结果。惟其衷于情，故对混浊时事始终抱着满腔激愤；惟其绝于情，故敢于对贤圣帝王“矢口便骂”。

除此之外，庄子还“每多愤世嫉邪之谈，又喜欢讥诮出名大户”^⑤。在《庄子》一书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是这样一类文字：

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

——《齐物论》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马蹄》

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胠篋》

这里，庄子怀着一种近乎否定一切的心理，对所谓的仁义道德及其制造者——圣人——展开了最激烈的批判。在他看来，仁义是造成社会“樊然淆乱”的根源，圣人则是导致天下大盗蜂起的祸首，正如有了珠宝才会产生窃珠之贼，有了圣人，有了仁义，才产生了那些打着冠冕堂皇招牌干着卑鄙勾当的窃国大盗。不是吗？“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篋》）这是屡为历史证明了的铁的事实，仁义适足以成为窃国大盗的保护伞；而这些窃国大盗在仁义的面纱下，又加倍地专制残暴，残民以逞：“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这种对老百姓愚弄、欺诈、压迫、镇压的做法，必然使得“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得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则阳》）这是何等有力的一问？这问句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倘若不是君主的专制残暴，倘若没有为残暴君主装点门面的圣人的仁义之法，世事怎能混乱到这种程度？君主们又怎能维护其专制统治而不被人民推翻？有见于此，所以，庄子把圣人们倡导的仁义比作对人施加的“黥刑”和“劓刑”（《大宗师》），大声疾呼：“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搥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胠篋》）

如果说，上述庄子对仁义、圣人的批判虽然激烈，但还稍欠具体，那么，下面我们便会看到庄子对标榜仁义的儒家之徒乃至